

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学术单刊第四种

抗日事迹讲演会

马来西亚
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ress
Southern College
Malaysia

- 欢迎学术界惠稿，作者将获赠三十册。
- 书内各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社、南院的立场。

本书出版印刷费由李氏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承印商：OREN PRINTING SDN. BHD.
34, Jalan Penaga 10
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前言

200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二时，马来西亚全国爱国工委会假南方学院大讲堂主办“抗日事迹讲演会”，由陈剑先生主持。出席者非常踊跃，老中青各阶层人士都有，场面热闹。为保存这罕见的史迹，研究所决定将讲稿出版，供文化界及学术界参考。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2004 年 4 月下旬

抗日事迹讲演会

从 1941 年 12 月 8 日起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止，这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时段，是马来亚人民的苦难岁月。在这战争的年代里，发生了多少惨绝人寰的悲痛事件，也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这是无辜生灵血泪流淌的岁月，这是烈士洒血捐躯，义薄云天的历史。

今天，我们在此缅怀先烈们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反抗法西斯所作的伟大贡献，为的是学习他们的反战，反霸权，保卫和平以及那种为革命和正义勇于战斗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我们有幸请到当年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参与战斗的老抗日军前来谈谈他们亲身经历的抗日事迹。让我们重温这段艰辛的日子，让年青一代从老人家的口中去了解当年的战斗故事，了解日军的残暴和战争的罪恶，从中学习如何在悲痛和艰险的日子中生存和成长。

1. 林 苏（原抗日军第八独立队战士）：

我参与抗日同盟斗争的岁月——回忆郑翼秋烈士

2. 岑远之（原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流动宣传队队长）：

抗日流动宣传队的工作

3. 陆彩萍（原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政工团团员）：

第四独立队二十中队与日军的战斗

4. 叶水渊（原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政委）：

石山脚九一事件

5. 马林（原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政委）：

马六甲的九五事件

6. 陈 剑（新马抗日历史学者）：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织和战斗

抗日事迹讲演会

(依现场录音整理)

◎陈剑(主持人)

首先，让我代表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欢迎大家出席这个抗日事迹讲演会。今天到会的竟超过两百位，踊跃的程度远超出我的意料，证明关心这个历史的还大有人在。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在座的有不少年青人，对年青的一辈来说，抗日是很遥远的事。然而，由于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撰写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你们须要了解抗日的事实。出席这个讲演会，能取得第一手的抗日史实，对马来亚历史的认识很有裨益。在座的还有我们尊敬的抗日老前辈如黄醉老先生，老远从巴沙威赶来，还有更远的来自文律和居銮等地方的朋友，专程来参加这个讲演会，我要特别感谢您们的光临。(掌声)

今天，我们特地从中国请回来当年参与抗日的老战士，到这里来亲自讲讲当年的抗日事迹，现身说法，这样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在过去，我想这是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的事。现在，马来西亚社会越来越进步，情况也越来越开放。今天我们终于有这样的机会来听听老人家、老战士们讲述他们亲身的经历。我想对我们、对下一代都是很有裨益的。

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轰炸新加坡,同时轰炸珍珠港,在吉兰丹还有暹罗南部宋卡登陆,正式入侵马来亚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这3年零8个月是马来亚人民一个苦难的岁月。不过也就在这3年零8个月里面,虽然发生很多惨绝人寰的悲痛事件,却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无数无辜的生灵惨遭杀害,许多人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牺牲。这也造就了一代烈士跟抗日英雄们,他们为保卫马来亚洒血捐躯,写就了义薄云天的马来亚光辉的一段历史。我们今天建立九一烈士纪念碑和马来亚人民抗日英雄纪念碑就是为缅怀先烈们,他们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反法西斯所做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为了学习他们的反战、反霸权、保卫和平以及他们那种为革命和正义、勇于战斗的精神,和那为正义事业而义无反顾的那种精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处心积虑地,还想恢复当年的军国主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举办这一类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在座的抗日老战士,我共请来五位。原来共有六位,但有一位因事未能出席。我请他们讲讲他们的抗日的亲身经历跟事迹。在我右边第一位是林苏先生。林苏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同盟斗争,后来是第八独立队的战士。接着下来是叶水渊先生。叶水渊先生是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的政委,他对“九一事件”非常清楚,因为“九一事件”发生后他受派到现场去做清理工作,对“九一事件”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接下来,在我最左边的是陆彩萍女士。陆彩萍女士当年叫陆明,她是原抗日军第四独立队政工团的团员,特别在柔南的海南港、玻璃城、士乃等等这些地方出没,所以她在这里有不少的战友,我想很多老人家都会记得她。在她旁边的是最老的抗日军,岑远之先生。岑远之先生原来是第三独立队的流动宣传队的队

长。在抗日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现在是香港新马归侨联合会的会长。我左手边这位是马林先生，他原名林朝宗，我想大家都见过的。马林先生是原第三独立队的政委。这里好几位都是在柔佛州抗日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谈这个历史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时间的关系，我首先请林苏先生谈谈北马当年的抗日同盟会的一些情况跟他参与斗争的情况跟感受。林苏先生请。

◎ 林苏

尊敬的马来西亚爱国工委，尊敬的各位学者和各位朋友，请原谅我嗓子坏了。因为在吉隆坡讲话太激动，太大声，坏了嗓子。无论如何，哑了也得讲，因为太感动了。我回到中国大陆 50 多年，每时每刻我都想起马来亚那些过去斗争过的同志们，尤其是“九一”牺牲了那些同志们。他们究竟怎么样，他们的事迹，英勇的事迹，人家知道吗？多少人知道啊？而这一次爱国工委以及马来西亚一些正义的人们在千辛万苦，冲破各种各样的冲击、阻挠，能够在这个吉隆坡的郊外叫什么，孝恩园是吗？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建立了一个“九一烈士纪念碑”。我们在广州听到非常非常的感动，无论如何再忙我都要回来拜祭。所以感谢爱国工委作出这么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天又能够给机会让我本人在这里，在马来西亚最出名的南方学院的课堂里，来讲过去我们参加抗日战争的情况，让我更加高兴。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郑翼秋烈士，我们在双溪呀兰(Sungai Galang)抗日同盟会负责人英勇牺牲的事迹。因为一向这个事情很少人知道，他怎么牺牲，人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次我在槟城拜托陈剑虹先生，因为我写了一篇东西，是回忆录，请他转交给他的家庭，了却我一个心愿。今天能够当着你们来讲这个事情，通过你们能够告诉人们知道，在马来亚有那么一个英勇的抗日斗士。使到他能够让大家都知道，都要向他学习。虽然只是一个人，却代表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抗日战争的光辉形象。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讲，我特别的感动、激动、感谢。现在，时间不多，只允许我十五分钟，不能多讲，但是我讲讲个人跟烈士的关系。

我叫林苏，今年79，过了春节就80。我原来是住在吉打州的双溪呀兰(Sungai Galang)。很小的时候就通过各方面的影响，参加抗日的募捐、宣传、演戏等活动。活动中还加上一些图片展览，使人们知道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烧杀辱掠我们的同胞，所以直接对这个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相当的仇恨。从1941年底到42年初，日本占领了马来亚，那个时候我17岁多，我是住在双溪呀兰的泰丰橡胶园那里，做postboy，就是通讯员。那一次突然间来了一批日本人、日本兵，他把我们的橡胶园包围了。所有的人半夜都被赶在一个地方，比较空旷的地方。我还穿着一条背心跟一条短裤。无论你经理也好什么都好，都集中一处。最后在我们的一个分园，橡胶园的分园也捉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叫文修义的老人家，他是我同学的父亲，海南人，在那里做采购的。由于在他的地方找到了一颗子弹，谁的子弹也不知道，也找到一个铜钱，圆圆的，一分钱一个的铜板，上面有两个旗，其中一边是武士旗，另外一边是国民党的党徽。结果就捉他到双溪北大年(Sungai Petani)杀头，无缘无故就这么被杀。还有我一个同学叫林顺清的母亲。她有林顺清、林顺明、林顺来，林顺金等好多个儿子。一个老太太因为在那个虎口刺了三个东西，三个点。很多人都喜欢刺这个纹身还是什么的，她就在虎口刺了这

三点东西，恐怕被当作抗日军的徽号，就被捉到双溪北大年 (Sungai Petani potong kepala, 就杀头。那时，杀了不少人，很惨的。日军实在杀人不眨眼，欢喜就杀，suka potong siapa, jadi potong, potong kepala, 就是这样的。没有一点道德、没有一点人性，根本就是比豺狼更加凶暴。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很愤怒。你来发展建设东亚共荣圈，要解救马来亚人民是这样解救的吗？是吗？杀人、屠杀、抢掠、强奸。所以激起了我们很大的仇恨。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老同学，上一级的学长郑翼秋同志，原名郑慈来，他挺身而出，做了双溪呀兰抗日同盟会的负责人，他动员我参加马来亚抗日同盟会。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参加，毫无犹豫的参加了。我们干什么来的呢，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捐款给抗日游击队，购买武器，弹药、医药、纸张给游击队。主要任务是这样。同时还印刷一个抗日的小报来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抗日，揭露日本人的罪恶。

不久，我们尊敬的郑翼秋同学被汉奸告发，捉了。捉到哪里，捉到双溪北大年 (Sungai Petani) 宪兵队。捉去以后呢，那就拷打，怎样打，我们不知道，最后我才知道。所以呢，我经常都很想念他。但不久，也有汉奸告密，由吉打州阿罗士打 (Alor Star) 警察局，日本的特高科，把我捉去了。这个捉呢，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捉，因为我的家就住在警察局的对面，他就叫一个警察过来，我心里知道他要捉抗日份子。就捉到对面蹲在一株树底下，一个警察叫做灰 “Ding”，他名叫 Ding，我记得有个叫做好像 Ah Ding, Cik Ding, 我们这样叫他，他的妈妈见到我的妈妈拿了一碗饭，弄了一点酱油，上面弄了一点小鱼，我蹲在那里吃饭，那个马来警察的妈妈见到了，说 “banyak kasihan” (很可怜)，她认为这样小你捉他干嘛。我听到

那个警长叫 Encik Ibrahim 长得很帅咧，他打电话，打到哪里我不知道，他讲 “orang banyak mudah, janganlah” (人家还非常小，不要捉吧!)，他是不想捉的。对方怎样讲，我也不知道。最后，陆陆续续又捉来三个，一个是方克武，卖冰水的，另一个是林木水，他是咖啡店老板的儿子；还有一个叫林明河，是一个做散工的，我们总共四个。只我一人参加了抗日的工作，他们三个是没有参加抗日的。最后呢，那个 Encik Ibrahim 就拦住一辆 Lori，他没绑我们也没上手扣，跳上那个 lori 就带走了。一去阿罗士打 (Alor Star) 的警察局，就关在拘留所，也没有问话，没有打，冤枉可怕极了。但是那个墙壁，白色的墙壁统统都是臭虫的血。一点点，都是血。我们的手放在墙缝边，臭虫一堆一堆就上来咬。三十多天当中，我们没有肥皂就只得干洗，生了许多的 “懒哥” (客语，一种癣疥类皮肤病) 啊！

有一天的十点来钟，我的 bilik (牢房) 对面，见到郑翼秋烈士被捉进来了，他是从双溪北大年押到阿罗士打 (Alor Star) 最高法院审判，他暂时寄放在那里。他洗澡，我假装痒痒，叫那个 Bangali (孟加里) 警察 “Datuk, saya nak mandi” (拿督，我要洗澡) 这样就跟去了。大家脱掉衣一看，他说阿苏 (Ah Su)，我的名字叫 Ah Su，你看看我的背，两个洞正在流浓血。我说怎么搞的，他说 “日本人打我很惨啊，辣椒水、坐飞机什么都来啊！最后他们没办法，他们捉来两条狼狗，有训练过的，他们就踩一下地上，那狼狗就扑上来，扑上这个背，说你讲不讲，不讲，他又再踩地下，二下，广东话叫 ‘叼着他’，含着他，说讲不讲，讲不讲……不讲，一二三，就这么一口，咬了一块肉”。就是这样，他背上被咬去两块肉，但还是那么坚定，坚决，视死如归。最后没有办法，再叫了一个台湾特务做翻译，

他说“你真顽固”(福建话),广东话叫“牙擦擦”,“让我看你的舌头”(福建话),当他伸出他的舌头时,这个特务很快就“啪”的一下,在他下巴一拳打上去,他牙齿很漂亮咧,牙齿在舌上插出几个洞,血流如柱。舌齿连心啊,都很痛的啦,舌头这么咬下去,就可以想像那个痛苦。最后哪,他还是笑着上法院去。他回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他今天被判处死刑,唉!我希望被判死刑不是他,我很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没有办法,一个星期以后,那Bangali警察很紧张地跑上来,说“Ah Su! Ah Su! di mana?”(阿苏!阿苏!你在那里?)“Apa tu?”(甚么事?),他说:今天有个年青人给日本人打了六枪才倒下, banyak “beng”(非常勇敢)!糟糕了,真正不幸的事情降临了,我们不能在敌人的面前流泪,我们的这个仇恨深深的烙印在我青年的心上。

从此以后,我从一个无知的幼稚青年人成长了。郑翼秋烈士的英勇牺牲,深深的教育了我,鼓励着我,他的光辉的形象,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从无知到有知,这样继续成长前进,所以我们此后在工作当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包括个人的得失,我们都不会想得太多,不去计较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大陆有个时期,领导跟我讲,要提拔我,结果没有,那就伤心,可是一想到烈士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牺牲他的生命,牺牲他宝贵的青春,那我们为个人的事情有什么可以考虑,再考虑势必可耻。我在1945年下山了,在居林(Kulim)的公会工作,那个今天不讲,好了时间到,谢谢大家。(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林苏先生。他刚才讲了这个郑翼秋烈士被处决的经过，以及他在参加同盟会的成长过程。现在我请岑远之先生谈谈他在第三独立队的时候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岑先生请。（掌声）

◎岑远之

马来西亚爱国工委的负责人，南方学院的领导跟贵宾们，我很高兴能利用这机会，利用 15 分钟来讲讲一些片段故事给大家听听。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回忆、有所促使自己往善前进。

我是怡保人，怡保出身。我受教育是在柔佛麻坡中化中学。我感谢马来西亚培养我能够使我成长，教育的一个目标是百年树人，我已经是树了，80 岁了，我虽然没有什高成就，但是我有一个很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自由、为了和平来奋斗一生，也为保卫马来亚奉献我的力量。因为我爱马来亚，所以对马来西亚有深刻感情。我谈谈我的一些感受，新山是我的邻居，峇都巴辖（Batu Pahat）和麻坡（Muar）我都住过，这些年也回来过。新山我曾来过开会两次。第一次是在 1945 年日军投降后，英国来接管的时候，抗日军解散前受检阅，我参加了。那时心里面很难受，要放下枪，通过和平的议会选举实现自治独立。结果，这个失败了。第二次就是今天来到贵院，来跟大家座谈，心情特别兴奋。我得感谢爱国工委邀请我们来访问，才有这机会访问南方学院。

参加这个筹建抗日英雄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的筹募工

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应该极力支持。当我接到这一通知，我就号召我们的会员报名，同时也动员和组织了碧珍歌舞团前来参加。结果许多团员都来了。在檳城，在吉隆坡演出了两场很成功，可惜碧珍歌舞团的团员都是受薪阶级，申请的假期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办法延期，所以昨天就回去了。很对不起大家。以后你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来，毫无推脱的，毫无代价的，我保证我做这个桥梁。

关于这个抗日纪念碑的事呢，我很感动，也很感慨。因为我很多同学牺牲了，被日本人残杀了。我的校董们，还有峇都巴辖 (Batu Pahat) 的麻坡 (Muar) 的校董们和亲戚也是被残杀了，所以，也是等于凭吊我的朋友亲戚和同学。

现在让我简单谈谈我在抗日时期的宣传工作。我是当时受到武汉合唱团的影响。武汉合唱团是抗战时期中国派到东南亚，特别是到我们新加坡、马来半岛来做抗日宣传。我喜爱音乐，所以参加了抗敌后援会，也组织抗日宣传队。抗敌后援会是一个全马的组织，我是抗敌的后援会的成员，所以我在麻坡念书的时候，就成立了麻北地区的抗敌后援会，领导整个柔北区，包括昔加末 (Segamat)，永平 (Yong Peng)，铁山 (Seri Medan)，拉美士 (Labis) 这些地区，都组织起来。公开的，地下的，秘密的抗日队，从小到大的，也有三个人，五个人的活动的流动宣传队，号召大家抵抗日本，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捐钱买花。我记得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就发动大家，全体同学卖花，同时动员到刘抗先生，刘抗先生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新加坡的国宝，他跟我们画漫画，支持我们的抗日。我们就是动员他帮我们画，画了我们就印，动员相馆，印了大量的，到一间一间店去捐钱筹款，筹了这些钱，捐到中国去支援难民，支援抗日军。这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多，到日本来占领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很凄惨！日军一进城就大量逮捕人，杀人，

奸淫辱掠，无所不为。

当时，马来亚暗无天日，人民过着悲惨的日子。有钱人苦，没有钱的更苦。有钱人被逼缴纳奉纳金，所有的有钱人有多少财产就要交多少奉纳金，没有钱的就把所有金器什么东西都得交出来。所以，很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抗日军。在参加抗日军之前，我们组织了地下支援部队，现在叫做后勤，在城市里面，发动朋友啊同学啊组织起来去筹捐军费，支持抗日军。

我因为搞宣传，战前也搞宣传，到日本来了还搞宣传，部队便安排我去抗日流动宣传队。武装的，带枪的，到占领区的农村去做宣传工作。当时人民都很害怕，一听到抗日军就害怕，一碰到老百姓，请他们支持，他们见到我们就走，怎么办？以唱歌来进行宣传教育，用唱歌的武器来鼓动他们，激励他们，所以慢慢的，群众就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支持我们抗日军。所以从害怕到不害怕，从没有粮食，没有枪支，没有弹药，没有人支持，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所以抗日军就不断壮大，从一百多人的队伍开始壮大到整万人，所以全马各地农村变成敌后的游击区。连一些警察都成为我们的情报人员。警察要向我们汇报“日本人什么时候要来了”。我们就准备埋伏打击他们，抢他们的枪壮大自己，所以抗日军就不断涨大，保卫了马来亚，保卫了世界和平，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是我们宣传工作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当时只能做到这样。这个是我简单介绍我抗日宣传的工作，讲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陈剑（主持人）

谢谢岑老先生，接下来我请陆彩萍女士特别谈谈第四独立队的情况和二十中队跟日军战斗的精彩片断。（掌声）

◎陆彩萍

尊敬的爱国工委会的先生们、各位学者和各位嘉宾，先生们、女士们，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原来是新加坡南洋女中的学生。当年，在1940年，我参加了铜锣合唱团。由于我参加了铜锣合唱团，受了爱国歌曲的影响，什么“歌八百壮士”、“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这么一大串抗日歌曲，让我认识了日本的残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就开始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认识。

接着，南太平洋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我就离开了学校到了柔佛的文律坡。我今天碰到了几位从文律来的嘉宾，我非常的高兴。到了文律，我就参加了当时叫做抗日救国会的抗日组织。1940年，那个时候我不过是14、5岁吧，是个小鬼。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就是一股热情，就是一种仇恨、想家。日本人来了，那我就参加了抗日军，到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司令部。

我下面就讲四独的司令部，当时的司令部就在上泗隆德茂芭所在的森林。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四独司令部一共搬迁过四到五次。这是由于日军的进攻，一次一次的围剿，司令部便从这个德茂芭搬进去，一直搬，越搬就越深，搬到玻璃城，最后就搬到天吉港，那个时候已是1944年初。那个地方是个非常的理想的所在，原来是英国人的一个石矿场。那里有发动机，有一条大河直接可以通到哥打丁宜

(Kota Tinggi)，还有一个小电船可用。那里很好，那个地方森林很密，那个地势也非常好，第四独立司令部基本就建在那里，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这里我想提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在天吉港当时，那是我们的天地。柔南的抗日群众都这么讲：“天吉港就是我们的小延安”。那里面有几个特点：它有抗日会的群众组织，有学校，有宣传队，还有自卫队，还自己出钞票。钞票当然很简单，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可以流行。要外面去，要买东西那就跟我们的抗日会去换，换成那个香蕉票出去买东西，这是一个特点。还有那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身份证。你出去要离开我们这个根据地，出去要拿一张身份证。回来的时候你有这个身份证，给你进来，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不行。我们就从这里面发现有一些是走狗、汉奸、进来探消息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一直待在那里，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后来联军空投，营地、电台，就在我们天吉港的周围，这是我们四独另一个特点。这个我想也是我们柔佛州的光荣，可以这么说。（掌声）

八个独立队中，只有我们四独有这么一个小天地、小延安。我们四独，战斗也是最多的，3年8个月里，我们大大小小的战斗达到三、四百次，非常之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柔南这里就是新加坡的前沿阵地。当时的日军政，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对柔南这个地方也不放过，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抗日军非常活跃，所以双方交锋战斗的次数很多。3年8个月各个独立队的战斗，在《马来亚抗日军》这本书里面有记录，我们是最多的。这个是我们的特点。其他我不讲，太多了，耽误了时间。

我在四独参加了这个政工团，我到了文律以后就到了司令部。以后这3年8个月就在柔南，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拉央拉央（Layang - Layang）到新山这一带。后来我就